

数智时代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

李慧平

(广州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 数智时代, 算法推荐、平台经济与数字设备的深度嵌入使青少年面临新型数字风险。本研究以粤北欠发达地市云浮为对象, 基于理论规范分析, 考察其青少年数字风险的总体状况、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研究发现, 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呈现低数字素养与高风险暴露并存的特征, 留守儿童、中职学生和农村女童是最为脆弱的群体。数字风险的生成是技术逻辑、平台逻辑、个体逻辑与社会逻辑四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四重逻辑形成正反馈循环, 使风险在欠发达农村地区被指数级放大。据此, 本文从制度、教育、技术、服务、社区五个层面构建治理路径, 优先修复家庭与社区支持系统, 打破四重逻辑的正反馈循环。

关键词: 青少年数字风险; 生成机理; 四重逻辑; 云浮

DOI: <https://doi.org/10.65196/ergkev88>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青少年日常生活, 带来算法茧房、信息极化、隐私剥削、数字成瘾等新型数字风险。与传统网络风险相比, 数智时代的数字风险具有复杂多变性、成因隐匿性、多重叠加性与跨域渗透性等特点, 风险治理愈发迫切。

近年来, 国家层面初步建立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框架。《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 增设“网络保护”章节,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766号) 于2024年施行, 配套文件从网络素养促进、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维度构建了保护体系。广东省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然而, 政策文本完善不等于治理效能达成, 欠发达地区基层执行中面临“最后一公里”落差: 跨部门协同碎片化、资源配置城乡失衡、基层执法能力不足, 政策目标与执行效果之间存在显著张力。

云浮市位于广东省西部, 是粤北欠发达地市之一。人均GDP长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城镇化率偏低, 农村家庭智能终端共享使用现象普遍, 基于单一设备绑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容易被绕过。同时, 云浮是劳动力输出大市, 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较高, 隔代监护为主要形态, 祖辈数字素养普遍偏低, 难以实施有效的内容过滤、时长管理和风险沟通。这些地方性特征使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问题具有不同于城市地区的独特形态。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问题: 云浮青少年面临哪些类型的数字风险? 哪些群体更为脆弱? 现行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存在哪些落差? 数字风险何以生成? 如何构建契合云浮地方实际的治理路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既是对国家青少年网络保护政策在基层落地情况的回应, 也是丰富数字风险治理研究在欠发达地区场景的理论探索。

二、文献综述

(一) 青少年数字风险的类型学研究

基金项目: 2026年云浮市青年发展研究助力“百千万工程”课题: 数智时代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编号: YF-2026-QFY170)。

作者简介: 李慧平(1990-),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早期研究沿用 EU Kids Online 框架,将风险划分为内容、接触与行为三类,但未能回应算法推荐技术嵌入后的新型风险形态。罗儒国(2026)指出新型数字风险具有成因隐性性、多重叠加性等特征。陈诗韵等(2023)对深圳 1279 名初一学生三年追踪,识别出网瘾风险组,发现核心症状呈动态演化:初一为“强迫性使用”等,初二为“满足感缺失”,初三为“戒断反应”。许博洋和涂欣筠(2024)对 8797 名高职学生调查发现,网络暴力行为与被害遵循“社会一个体—互动”链式诱发机制,且存在“内在衍化”,即行为对被害有显著正向影响。现有类型学研究多基于城市样本,对欠发达农村地区关注不足。

(二) 青少年数字风险的生成机制研究

徐丽敏和李琦(2025)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三维度、四层面培育框架。田雨等(2026)发现累积生态风险与手机成瘾呈正加速模式,通过心理资本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产生影响。刘悒涛等(2024)以广东乐昌市 2077 名留守儿童为对象,发现家庭累积风险通过负性情绪完全中介影响网络成瘾,逆境信念调节中介路径且存在性别差异,该研究在地理邻近性与群体特征上与云浮高度相似。陈诗韵等(2023)引入失补偿假说,指出建设性补偿使青少年从过度上网恢复正常,病态性补偿则导致发展偏差。现有研究多采用单一理论视角,缺乏多重逻辑交互的整合分析。

(三) 青少年数字风险的治理研究

潘锡杨(2026)指出,学校、家庭、平台企业之间存在系统脱耦,学校的正面引导可能在家庭场景中被消解,家庭的努力可能被平台算法抵消,并提出课程共研、内容共控、风险共防的协同框架。许博洋和涂欣筠(2024)提出构建控制、支持系统和家庭、校园、网络一体化的被害预防体系。罗儒国(2026)从教育干预角度提出匡正认知、提升师资、统整内容、拓展方式、健全保障的系统路径。孟玺等(2025)提出政府规制赋权、算法素养赋能、平台责任赋责的治理路径,发现感知收益的中介作用比感知风险更显著。现有治理研究多基于城市经验,对欠发达地区资源约束考虑不足,缺乏对基层执行障碍的系统分析。

三、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总体状况、主要类型与分布特征

(一) 云浮市青少年数字生态的基本面貌

云浮市位于广东省西部,下辖云城区、云安区、罗定市、新兴县、郁南县,是粤北欠发达地市之一。人均 GDP 长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化率偏低,农村人口占比较高,是广东省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近年来农村宽带覆盖率与智能终端普及率逐年提升,但与珠三角城市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云浮农村家庭智能终端使用具有“低门槛接入、高密度共享”特征,即一台智能手机往往由祖辈与孙辈共用,甚至多子女共用。同时,云浮作为劳务输出大市,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较高,隔代监护为主要形态。农村学校在数字素养教育资源配置上与珠三角城市存在显著差距。

(二) 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主要类型

基于现有文献分类框架,结合云浮地方实际,本研究将云浮青少年面临的数字风险归纳为四类:

内容风险。指青少年接触不健康、不适宜或具有潜在危害性的信息。网络空间信息良莠不齐,青少年长期暴露在错误信息环境中且缺乏价值判断力,可能造成价值认知错位。在云浮农村,青少年阅读面较窄,信息获取渠道有限。

接触风险。指青少年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可能遭受的直接或间接威胁。网络暴力行为与被害均遵循社会、个体、互动的链式诱发机制,行为对被害有显著正向影响。我国青少年网络受欺负发生率为 11.2%~56.9%。在云浮农村,农村女童在隐私安全与网络性引诱方面具有特殊脆弱性,留守儿童在遭遇网络欺凌后往往缺乏有效的倾诉对象与干预支持。

行为风险。指青少年在数字空间中实施的越轨行为或失控行为。网络成瘾是在互联网特殊背景下不借助成瘾物质的失控行为。青少年网瘾风险组占比 11.65%,其网瘾水平在初二至初三期间迅速上升。在云浮,农村青少年课余生活较为单调,网络游戏和短视频成为其主要娱乐方式。非理性消费风险在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村家庭中,其损害的社会放大效应更为显著。

算法认知风险。数字风险具有成因隐性性,学校教师及教育管理者往往无暇顾及。个性化算法推荐通过击中青少年兴趣、提升用户黏度,实际起到塑造、控制青少年网络交往和社区关系的

作用。在云浮农村青少年群体中，由于阅读面窄、抽象推理训练不足、接触多元信息的渠道有限，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更接近“窄化性推荐”，将用户锁定在日益狭窄的信息通道之中。

（三）风险在群体间的分布特征

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最脆弱的群体。在云浮农村，祖辈“只有干不完的活，给他手机就别闹就行”的监护策略，实质上是以数字设备的无限制使用换取暂时的家庭秩序。留守儿童面临更高的家庭累积风险，其风险暴露程度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中职学生。与普通高中学生相比，中职学生学校管理相对松散，部分学生较早脱离升学压力环境而进入事实上的“管理真空”。在云浮，中职学校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庭，其家庭数字监护条件与留守儿童具有相似性，而学校管理的相对松散又进一步削弱了制度性保护。

农村女童。女生在负面情绪、逆境信念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而网络成瘾得分则低于男生，女生的数字风险更多表现为情绪层面的问题。在农村，性教育、隐私保护教育的供给尤为匮乏，女童在面对网络性引诱时缺乏必要的辨识能力与求助渠道。此外，农村女童在家庭中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弟妹的责任，其数字设备使用时间和空间受到更多限制，这可能导致其数字风险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存在。

（四）现行政策在云浮基层的执行落差

跨部门协同的体制碎片化。网信、教育、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边界不够清晰，缺乏制度化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潘锡杨，2026）。在云浮县域层面，县级部门编制有限、专业人才匮乏，跨部门协调成本更高。

学校执行的形式化困境。罗儒国（2026）指出，仅 39.9% 的学生表示学校开设了网络安全教育相关课程，13.88% 的受访学生反映信息科技课程并非必修课且常被占用。在云浮农村学校，信息科技课程被占用或缩水、数字素养教育流于形式的现象同样存在。学校管理者、教师对政策的知晓率与执行意愿受制于基层工作负荷与专业能力，政策要求与执行效果之间存在显著张力。

家庭监护的结构性缺位。政策文本中所设想的“家庭监护”在云浮农村隔代监护场景中近乎悬空。祖辈既无数字技能也无风险意识，政策要求与基层实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冯强和宋爽（2024）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村父母对子女网游实践的管理方式呈现限制使用的单一特征，多为硬性、粗暴地干预子女的手机或电脑使用权。这种限制型干预并未收获良好效果，反而激发了子女的游击战术抵抗。在云浮农村，类似“摔手机”“设密码”“夺手机”的干预方式同样普遍，但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专业支持服务的可及性不足。12355 青少年服务台等专业支持渠道在乡镇以下层级的知晓率和可及性极低。专业心理咨询师、社工人员的配置集中于地市级，农村地区几乎空白。罗儒国（2026）指出，学校层面的信息技术安全与风险教育主要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信息技术课教师、班主任、保卫处工作人员等担任，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安全教育或风险教育教研室/教研组，更缺少敏捷型风险教育组织或风险教育共同体。在云浮农村学校，专业师资的匮乏更为严重。

四、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生成机理

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生成是技术逻辑、平台逻辑、个体逻辑与社会逻辑四重因素交互作用、叠加放大的结果。

（一）技术逻辑：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的认知窄化

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即时反馈与精准推送，将使用者锁定在日益狭窄的信息通道中。青少年前额叶皮层发育较晚而边缘系统活跃，更易受网络即时反馈诱惑。在云浮农村，由于阅读面窄、批判意识薄弱，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更接近“窄化性推荐”，不是丰富信息视野，而是将用户锁定在狭窄通道中。网络成瘾导致更低解释水平和更高延迟折扣率，形成“算法推送强化即时满足偏好、即时满足偏好加深算法依赖”的相互强化关系。农村青少年由于阅读面窄、批判性思维训练不足，面对不良信息时更缺乏辨识与抵御能力，算法推荐系统更容易使其形成信息茧房与认知窄化。

（二）平台逻辑：注意力经济与保护机制的结构性失灵

数字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是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长。多数平台“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内容池匮乏、防沉迷机制漏洞明显，极易被绕过。在云浮农村，一台手机由祖孙共用或多子女共用是常态，基于“一人一机一账号”设计的保护机制基本失效。农村青少年普遍用父母身份证注册游戏账号以绕过时长限制。平台算法的不透明性也使地方监管部门缺乏穿透式监管手段。学校信息科技课程被占用或缩水、数字素养教育流于形式的现象，也与平台保护机制未能有效嵌入学校教育场景有关。

（三）个体逻辑：认知局限与风险感知的系统性偏差

青少年对自我认同、社交、娱乐的心理需求强烈，当现实无法满足时往往转向网络索取。风险感知的乐观偏见普遍存在，降低了采取预防性行为的动机。在云浮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进一步放大了个体局限。不少教师重视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而忽视风险防范能力培养，信息科技课程在升学导向下被严重边缘化，学生缺少将风险知识转化为风险规避行为的实际能力。农村青少年由于阅读面窄、抽象推理训练不足，面对不良信息时更缺乏辨识与抵御能力。农村女童在家庭中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弟妹的责任，其数字设备使用时间和空间受到更多限制，这可能导致其数字风险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存在，从而增加了遭遇网络风险的概率。

（四）社会逻辑：家庭—学校—社区三维支持的缺位

家庭层面，云浮作为劳务输出大市，隔代监护是普遍形态。留守儿童面临更高的家庭累积风险，祖辈数字监护实际处于“空心化”状态。家庭累积风险通过负性情绪影响网络成瘾，逆境信念调节中介路径且存在性别差异。养育倦怠通过降低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进而增加其网络游戏成瘾水平。农村父母对子女网游实践多采取硬性干预，反而激发了子女的游击战术抵抗。学校层面，数字素养教育在升学导向下被边缘化，信息科技课程常被占用，乡村教师数字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社区层面，乡镇和农村缺乏针对青少年数字安全的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数字安全网络几乎空白。

（五）四重逻辑的叠加放大效应

四重逻辑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以“社会逻辑缺损”为基础性放大器，形成螺旋上升的风险累积闭环。社会逻辑的薄弱使青少年获得不受约束的设备使用权，并以未经训练的风险认知状态进入数字世界；平台逻辑捕获其注意力后，技术逻辑以算法精准推送持续塑造其认知偏好；个体逻辑的局限使其既无法觉察风险累积，也缺乏主动突破茧房的行为动机。在云浮这类欠发达农村地区，这一正反馈循环运行尤为强劲，因为支撑干预的社会资源最为稀缺。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单一环节修补，而在于打破四重逻辑的正反馈循环。

五、治理路径与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分析，本章从制度、教育、技术、服务、社区五个层面提出治理路径。核心原则是：欠发达地区数字风险治理不能简单移植城市经验，必须优先修复“社会逻辑”薄弱环节，否则技术和制度干预将被系统性消解。

（一）制度层面：推动地方实施细则落地与跨部门协同

依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授权地方细化的空间，建议云浮市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方案，将农村留守青少年列为重点保护对象，针对隔代监护场景设计专门的家庭监护支持措施。在此基础上，由市委网信办牵头，联合教育、公安、民政、文旅、市场监管、共青团等部门建立县级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权责清单，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同时，建议将青少年数字风险防控成效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置学校数字素养课程开设率、12355平台本地接通率、社区数字安全活动开展频次等可量化指标，以考核促落实。此外，应定期发布《云浮市青少年数字风险年度报告》，建立风险预警分级响应机制，并研制涵盖数字技能掌握、数字风险防范、数字化理素养及心理复原力等维度的简化评估工具，为政策动态调整提供依据。

（二）教育层面：数字素养教育的校本化下沉

按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分学段设计数字素养课程目标与内容，实现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变，确立意识、知识、能力、伦理“四位一体”的数字风险教育目标。在云浮农村学校，课程设计应超越技术操作，注重培养学生识别算法推荐逻辑、辨别信息真伪、管理个人隐私的实践能力。在师资方面，可利用广东省全口径全方位融入式帮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机制，争取珠三角对口帮扶资源，优先培训农村学校的信息科技教师和班主任，使其具备开展数字风险教育的基本能力。针对留守家庭的隔代监护人，应开展数字安全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子女进行数字使用的沟通与协商、如何设置设备使用规则、如何识别常见的网络风险信号等，可依托社区学校、家长会、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日常走访等渠道送达监护人，推动家长从“焦虑的管控者”向“智慧的引导者”转变。此外，可培训高年级学生成为“数字安全小卫士”，在同辈间开展风险识别与互助，使同辈群体成为风险防范的积极力量。

（三）技术层面：保护模式的本地化适配

呼吁与头部平台协作，开发“农村版”青少年保护工具，包括低流量消耗的离线内容包，使青少年在网络条件受限时仍可使用优质内容；优化多设备共享场景下的账号管理功能，避免一台手机多人使用导致保护机制失效；丰富青少年模式的内容池，增加符合农村青少年兴趣的优质内容，降低其主动弃用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可探索集成内容过滤、时长管理、应用屏蔽、风险预警等功能的“护苗”数字工具箱，免费向农村家庭推广，工具箱应具有操作简便、资源占用低、适配低端设备等特点，注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娱乐性的平衡。此外，依托云浮市政务大数据中心或教育城域网，建立青少年网络使用风险监测平台，实现深夜长时间上网、频繁搜索高危关键词等异常行为的发现与预警，监测预警网络的建设应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吸纳平台企业和学校参与。

（四）服务层面：依托 12355 平台拓展风险咨询与干预

强化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云浮本地化服务能力，增加本地坐席与专业心理咨询师配备，开通数字风险专项咨询通道，延长夜间服务时段以匹配青少年上网高峰，通过学校宣传、社区海报、短视频推送等方式提高其在乡镇以下层级的知晓率。在个案干预方面，应与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建立风险个案的转介与联合干预流程，制定针对青少年遭遇诈骗、欺凌等严重网络侵害的标准化应急处置预案，学校层面由心理教师及时介入提供情感支持、法制副校长提供法律咨询与维权指导，家庭层面由家长承担情感安抚与证据保全的核心角色，平台层面承担锁定电子证据、暂停涉事账号、配合执法部门调查的法定义务并建立快速响应的“绿色通道”。此外，应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网络，线上依托 12355 热线与小程序/公众号，线下依托学校社工站、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打通服务递送的“最后一米”，并可依托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和社区网格员，将数字风险咨询与干预嵌入既有基层公共服务末梢。

（五）社区层面：构建基层数字风险监测预警网络

将青少年数字风险纳入社区网格员的巡查事项，建立“网格发现—分级上报—协同处置”的工作闭环，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重点关注留守儿童是否长时间独自使用手机、家庭是否缺乏基本的数字监护条件、青少年是否出现明显的网络沉迷行为等信号，发现异常后及时上报并转介至相关部门。在云浮选取若干镇村开展“数字安全示范社区/乡村”试点，探索社区主导、家庭参与、企业支持、社工介入的基层治理模式，试点内容可包括设立社区数字安全教育角、定期开展家长数字素养培训、组织青少年数字安全主题活动、建立社区数字风险举报渠道等，形成可复制经验后逐步推广。此外，应将青少年数字保护纳入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帮扶事项，使数字安全治理与乡村振兴工作形成合力。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薄弱，普遍缺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等文化空间，农村子女只能通过手机和电脑等媒介接触外界。因此，社区层面的治理不能仅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致力于丰富农村青少年的课余文化生活，提供替代性的健康娱乐方式，可依托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为农村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线下活动空间和文体设施，从根本上减少其对数字设备的过度依赖。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理论规范分析，对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的总体状况、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云浮青少年数字风险具有“低数字素养与高风险暴露并存、经济损害社会放大效应显著、专业干预资源严重匮乏”的特殊样态。留守儿童面临家庭数字监护的“空心化”，中职学生处于学校管理松散与社会化过早的夹缝之中，农村女童在隐私安全与网络性引诱方面具有特殊脆弱性，这三类群体的风险暴露程度显著高于其他青少年。

第二，数字风险的生成是技术逻辑、平台逻辑、个体逻辑与社会逻辑交互作用的涌现性结果。四重逻辑以“社会逻辑缺损”为基础性放大器，在云浮这类欠发达农村地区，社会逻辑的薄弱使技术逻辑和平台逻辑的风险侵蚀效应被指数级放大。

第三，现有治理体系效果不彰的深层原因，在于“标准化的全国方案”与欠发达地区执行力之间的结构性落差。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单一环节的修补，而在于打破四重逻辑的正反馈循环，优先着力点应是修复最薄弱的社会逻辑环节。没有家庭与社区支持系统的重建，技术和制度的干预将被系统性消解。

政策启示如下：

对云浮市而言，建议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方案，将农村留守青少年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建立县级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纳入县级政府绩效考核；依托12355平台拓展风险咨询与干预服务；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嵌入数字风险发现职能。

对广东省而言，建议设置“欠发达地区弹性执行条款”，将资源倾斜重心从“技术硬件配备”转向“社会支持网络重建”，优先支持农村地区隔代监护人数数字素养培训、农村学校数字素养教育能力建设、社区数字安全公共服务供给。

对国内同类欠发达地区而言，城市地区以“技术防控”和“平台责任”为核心的治理策略，在农村地区因设备共享、监护缺位、数字素养低下等条件约束而效果有限。欠发达地区的治理路径应优先修复“社会逻辑”的薄弱环节，只有社会逻辑的“缓冲垫”得到修复，技术和制度干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1] 罗儒国. 青少年数字风险教育的现实阻滞与纾解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65(1): 179-188.
- [2] 陈诗韵, 屈笛扬, 卜禾, 等. 迷“网”的少年: 网瘾风险青少年的症状演化[J]. 心理学报, 2023, 55(9): 1465-1478.
- [3] 许博洋, 涂欣筠. 青少年网络暴力的形成机理——链式诱发、内在衍化与风险叠加[J]. 青年研究, 2024, (2): 27-39+94-95.
- [4] 徐丽敏, 李琦. 逻辑框架与政策路径: 数字中国战略下青少年数字韧性培育体系研究[J]. 社会政策研究, 2025, (4): 97-108+135.
- [5] 田雨, 秦雪莲, 丁洪君. 累积生态风险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 心理资本和自我控制的作用[J]. 应用心理学, 2026, 32(1): 47-55.
- [6] 刘怿涛, 张鸾苏, 周钰琪, 等. 留守儿童青少年家庭累积风险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4, 22(6): 791-798.
- [7] 潘锡杨. 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协同机制研究——基于学校、家庭与平台企业的角色重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6, (6): 78-82.
- [8] 孟玺, 李庆霜, 霍帆帆. 社交媒体用户参与算法风险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情报, 2025, 45(5): 49-65.
- [9] 冯强, 宋爽. 网络游戏的“成长陷阱”: 农村青少年网游活动、媒介干预与社会再生产[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 53(4): 148-156.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of Digital Risks Faced by Adolescents in Yunfu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LI Huiping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511363,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devices has exposed adolescents to new types of digital risks. This study focuses on Yunfu, a less-developed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northern Guangdong, and,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 examines the overall status, mechanisms of emergence,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of digital risks among adolescents ther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risks among Yunfu's adolesc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low digital literacy and high risk exposure,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rural girls being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s.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risk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four factors: technological logic, platform logic, individual logic, and social logic. These four logics form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causing risks to be amplified exponentially in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overnance pathway across five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ical, service-oriented, and community-based—prioritizing the restoration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s to break the positive feedback loop of the four logics.

Keywords: digital risks among adolescents; mechanisms of emergence; four logics; Yunfu